

一部夏史，始终纠缠在传

说和信史的困惑之中，研

究者们常常摇摆 in 历史与

传说之间，时而打开了时

空的隧道，时而又掩闭其

门、另辟蹊径，但从总的

趋势来看，大家为了弄清

夏史的真相，艰难地向前

跋涉着，逐步看到了夏史

的曙光。

李学勤 主编
孟世凯 副主编

夏史与夏代文明

詹子庆 著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中国古代历史与文明 夏史与夏代文明

李学勤 主编
孟世凯 副主编
詹子庆 著

- 一 在历史和传说之间跋涉
- 二 史籍中的吉光片羽
- 三 手铲释天书
- 四 夏族的起源
- 五 夏代兴亡
- 六 早期国家形态
- 七 夏代地域及其邦盟
- 八 华夏文明之光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夏史与夏代文明 / 李学勤主编.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07. 4

(书馆考究. 中国古代历史与文明丛书)

ISBN 978-7-5439-3147-3

I. 夏… II. 李… III. 中国—古代史—研究—夏代 IV. K22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0906 号

责任编辑: 张 树

特约编辑: 那荣利

封面设计: 许 菲

中国古代历史与文明

夏史与夏代文明

李学勤 主编 孟世凯 副主编 詹子庆 著

出版发行: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武康路 2 路

邮政编码: 200031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苏昆山市亭林彩印厂

开 本: 740×970 1/16

印 张: 14.75

插 页: 4

字 数: 206 000

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 000

书 号: ISBN 978-7-5439-3147-3/K·50

定 价: 25.00 元

<http://www.sstlp.com>

序

李学勤

《中国古代历史与文明》共六卷,包括《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夏史与夏代文明》《商史与商代文明》《西周史与西周文明》《春秋史与春秋文明》《战国史与战国文明》,是中国先秦史学会组织撰著的一套先秦史系列。

这套书的诞生,有着时代的背景和特定的机缘。

近年间,随着中国国势走向振兴,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越来越受到世人关注。这对于中国这样具有深厚悠久历史基础的国家来说,应该说是必然的。绵延连续,从未断绝,乃是中国传统的特性,因此要深入理解中国,不能不求诸历史,而且必须上溯其历史长河,以追寻其形成奠基的根本,也便是上古的先秦时期。自从二十几年前的“文化热”,直到最近盛兴的“国学热”,贯穿着对中国传统的反思和探究,也总离不开先秦时期种种问题的讨论。

1996年,作为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计划项目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这一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交叉结合的大型科研项目,总目标是使作为先秦时期重要部分的夏、商、西周的年代学进一步量化,为更好地研究古代历史文化、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及早期发展打下良好基础。2000年新世纪来临之际,“夏商周断代工程”阶段性成果通过验收,公布了“夏商周年表”。中国先秦史学会同人不少参加了有关

工作,获有启发,一些出版界友人也受到激励。经过再三酝酿,于是拟定编写这套《中国古代历史与文明》的计划。这个计划幸能得到先秦史各分段多位专家的支持,终能将这六卷本的系列贡献给读者。

中国悠久的历史究竟怎么分期,是学术界长期探讨的问题,学者们见仁见智,各持己见,但是无论如何,先秦时期和秦汉以下之间总是有一条明显的分界线,在历史的研究方法上也有着较大的差异。先秦史研究有其本身的特殊性,由于传世文献的有限,不能如秦汉以下那样以载籍为主体,而是年代越古,越需要依靠考古学等学科的成就。

具体来说,先秦史又可大致划分两大阶段:从远古以至唐、虞,是所谓传说时期,与后来的夏、商、周三代有所不同。这只是根据现有研究情况来讲的,两阶段间并没有很清楚的界限。比如唐、虞有没有可能划下来,和三代合为“四代”,像《大戴礼记》说的,便很值得斟酌。

不管是传说时期,还是后来的夏、商、周三代,在研究途径上都需要多学科的交叉,主要是历史学与考古学(还有与考古学密切关联的古文字学)的结合。夏鼐先生曾在《什么是考古学》一文中讲道:“考古学研究的对象只是物质的遗存,这包括遗物和遗迹。所以它和利用文献记载进行历史研究的狭义历史学不同。虽然二者同是以恢复人类历史的本来面目为目标,是历史科学(广义历史学)的两个主要的组成部分,犹如车子的两轮,飞鸟的两翼,不可偏废,但是二者是历史科学中两个关系密切而各自独立的部门。”我个人体会,夏鼐先生不仅讲了考古学作为学科的独立性,也非常生动地说明了它和历史学(狭义)相辅相成的关系。多年来先秦史研究的前进,正是靠着这“两轮”、“两翼”。

即使是传说时期,情形也是如此。应该特别强调的是,古史传说也是古史的一部分,而且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去年我有机会去河北省作一次演讲,谈及炎帝、黄帝传说和文明起源研究,曾引述王国维、徐炳昶、尹达等先生的观点。大家熟悉,王国维先生1925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讲授《古史新证》,他针对当时关于古史的讨论,

指出世界各民族的古史总是史实和神话交杂在一起,其间固然不免有后人增加的成分,但一定有史实的“素地”,也即历史的背景。他在《古史新证》中,还专门提出文献与地下材料互相印证的“二重证据法”。到1936年,出版了两种有关这一问题的书,即徐炳昶先生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和尹达先生的《中国原始社会》,两者都接续和发展了《古史新证》的观点,主张将古史传说的研究与考古学成果互相结合融会。

撰著《中国古代历史与文明》的各位先生,对于各卷涉及的学术问题都能抒发多年心得,立足最新前沿,视野弘阔,精义纷呈。如果说有什么共同点的话,我想就在于把历史学和考古学紧密结合起来,努力为先秦史的进展开拓一个新境界。在这里,我谨代表中国先秦史学会,向各位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也要感谢策划和出版这套系列图书的出版社各位先生给予的大力帮助。

2007年3月12日于北京

目 录

1 在历史和传说之间跋涉 / 1

- 一 代代相传的接力棒 / 1
- 二 不同角度的聚焦 / 9

2 史籍中的吉光片羽 / 19

- 一 《诗》《书》传诵 / 19
- 二 珍贵的记闻 / 24
- 三 夏世谱的流传 / 25
- 四 先秦诸子的夏史观 / 27
- 五 《夏小正》与夏历的瓜葛 / 32
- 六 “奇书”也有不奇处 / 33
- 七 司马迁的首功 / 40

3 手铲释天书 / 43

- 一 打开尘封的历史 / 43
- 二 古都郑州遗址的惊世发现 / 46
- 三 豫西调查记 / 47
- 四 热潮滚滚来 / 50
- 五 任重而道远 / 54

4 夏族的起源 / 61

- 一 鲧的传说 / 61
- 二 夏族探源 / 64

5 夏代兴亡 / 72

- 一 大禹事功 / 72
- 二 传子制的确立 / 96
- 三 甘之战 / 99



四 夷夏之争 / 104

五 少康中兴 / 112

六 孔甲乱夏 / 114

七 夏桀灭亡 / 115

6 早期国家形态 / 122

一 从族邦到王国 / 122

二 “夏后氏官百” / 132

三 “天下共主”的地位 / 138

四 贵贱有等的社会结构 / 141

五 “夏礼吾能言之” / 145

7 夏代地域及其邦盟 / 149

一 《禹贡》“九州” / 150

二 王畿和中心统治区域 / 160

中国古代历史与文明

夏史与夏代文明

三 夏文化圈 / 165

四 方国林立 / 176

8 华夏文明之光 / 186

一 农业文明 / 189

二 青铜文明 / 192

三 玉石制造及其他 / 194

四 夏人的精神世界 / 202

参考文献 / 216

附表 / 223

夏世系表 / 226





1

在历史和传说之间跋涉

一 代代相传的接力棒

一部夏史,始终纠缠在传说和信史的困惑之中,研究者们常常摇摆在历史和传说之间,时而打开了时空的隧道,时而又掩闭其门、另辟蹊径,但从总的趋势来看,大家为了弄清夏史的真相,都艰难地向前跋涉着,逐步看到了夏史的曙光,尤其是近四十多年来的考古成就,带给研究者的则是更大的希望和信心。

夏史研究的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 夏史文献资料整理和研究的先期阶段

清以前的资料整理阶段。每个民族都重视本民族的世系,先秦时代关于五帝传说和夏商周三代的世系应有不少传本。现存《世本》和《五帝德》、《帝系》可能就是这些传本的遗篇。西晋咸宁五年(公元279年)发现的魏国编年史《古本竹书纪年》记载了夏史世系、纪年和重要事件,这是战国时代魏国学者整理夏史资料的重要成果。司马迁著《史记·夏本纪》是系统整理夏史资料和夏史研究的开山之作,其功不可没。篇中记录夏世系和夏史大事、禹贡九州等内容,必有所本,不能轻易怀疑。

此后西晋皇甫谧撰《帝王世纪·夏纪》，宋人罗泌撰《路史·后纪·夏后氏》，都是在《史记·夏本纪》基础上“博采经传杂书”，使夏史资料进一步系统化，但所取资料多来自古文《尚书》和其他再生资料，且加以神化，故其资料学术价值未必像《史记·夏本纪》那么珍贵。

清学者马骥(1621—1673)撰《绎史·夏史》四卷，内容有：禹平水土、夏禹受禅、少康中兴、商汤灭夏。该书取材于唐以前典籍，搜罗殆尽，系统整理夏史资料，便于研究者查阅查验。然所收资料真伪不分，谰纬附会之文夹杂其中，且把岿嵝碑误认为夏碑更是大错，每段后所附作者评述，因受其史观所限，参考价值不大。

崔述(1740—1816)，是近代以来疑古派的鼻祖，他著《考信录·夏考信录》两卷。这是一部挑战传统文献、在辨伪考信基础上试图建立可信的夏史系统的论著。书中表述他对夏史的总体看法是“唐虞之政即夏政也，禹之继治然也”，“启又贤，能承继禹之道”，然太康后中衰，“仲康微弱，后相失国，夏政不行于天下也”。其说大致不误。他对夏史资料中来源于“伪书”和汉儒的一些谬说做了用心辨正，试图揭开蒙在夏史上的面纱，给后来研究者以启示。不过，由于受时代和辨伪方法的某些局限，他不可能真正做到求真，其主观臆断之辞常溢于言表。

(二) “二重证据法”的提出和“古史辨”派的影响

在20世纪20—30年代，出现了几位史学大师举起几面大旗，现分述如下：第一位就是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1877—1927)，他在1925年为清华国学研究院讲课而撰写了《古史新证》^①。书中所提出的“二重证据法”是中国近代史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影响至为深远。其中有关夏史的论述，更为研究者奉为圭臬。现摘录如下几段以供品味：

“研究中国古史为最纠纷之问题，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二者不易区别，此世界

^① 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

各国之所同也。”

王国维一面主张要纠正“信古之过”；另一方面批评当时学术界存在着的“疑古之过”，他论述道：“乃拼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加以肯定可断言也。”（《古史新证》，第1—2页）

《古史新证》第二章——禹，以春秋时代秦公敦（簠）和齐侯镈、钟铭文为证，肯定文献记录的禹其人其事并非虚妄之言。书中述道：“自《尧典》、《皋陶谟》、《禹贡》皆记禹事，下至《周书》、《吕刑》亦以禹为三后之一，《诗》言禹者尤不可胜数，固不待藉他证据。然近人乃复疑之，故举此二器知春秋之世，东西二大国无不信禹为古之帝王且先汤而有天下也。”（《古史新证》，第4—6页）王国维对当时学术界怀疑禹的说法持排斥态度。

王国维先生首先用甲骨文论证商史，发现于甲骨文上的商先公先王世系与《史记·殷本纪》上的世系，“虽不免小有舛驳而大致不误，可知《史记》所据之《世本》全是实录。而由殷周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最后，他提出对古书的一些看法：“又虽谬悠缘饰之书，如《山海经》、《楚辞·天问》，成于后世之书如《晏子春秋》、《墨子》、《吕氏春秋》，晚出之书如《竹书纪年》，其所言古事亦有一部分之确实性，然则经典所记上古之事，今日虽未得二重证明者，固未可以完全抹杀也。”（《古史新证》，第52—53页）

显然，这些话都是针对当时学术界出现的疑古思潮而有所发的，反映先生真乃独具慧眼，开了当时学术风气之先。

顾颉刚先生（1893—1980）是国学大师，他创立“古史辨”派，于1923年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在五四运动推动下，他对清理传统史学，批判封建道统，重新

构建古史体系,培养出一批史学大师,其功不可没。然顾先生受崔东壁等学者疑古思潮影响,后来证实他的某些观点有“疑古”过头之失。随着学术的发展,而先生本人在 60 余年的学术生涯中,也不断修正自己的一些看法。

他对夏史研究,主要观点有:

1. 他依据《说文》“禹”字解释,假设禹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后又假定禹是南方民族神话中的人物。再后又认为禹的传说产生于西方戎族,原为戎的宗神,随着九州、四岳的扩大演化为全土共戴的神禹,更演化为三代之首君。对于禹为动物说,他晚年仍坚持不变^①。

2. 他与童书业合写的《鲧禹的传说》和自撰的《息壤考》,对鲧禹治水传说的演变,认为最早文献记载,禹是禹,夏是夏,两者毫无关系。把鲧禹说成父子,鲧与夏发生关系,始于战国时代成书的《国语》与《左传》,鲧禹治水用不同方法,也是出自战国文献的记载^②。

3. 他与童书业合写的《夏史三论》,论述启和三康五观和羿浇的故事是后人编造的,是传说,不是夏代的史实^③。

4. 顾先生不怀疑夏朝的存在,他依据文献,对夏的都城和疆域做了探索,并试图用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考古资料来印证夏的存在。

李民认为顾先生的学术观点后来有变化,“他到了六七十年代不但承认有夏史,而且非常赞成古史与考古发掘相互结合”。并列举 1974 年顾先生写给他的信为证,信中说:“偃师一地之新发掘,据北大友人言,龙山文化之下层为仰韶文化,有规模颇伟之建筑遗址,说不定是夏代物。按此地洛阳东,洛阳是夏桀所都,见于《逸周书·度邑》及《史记·吴起列传》。洛阳之西,即秦岭,《左传》所云:‘崤有二陵焉,其

① 《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二册,第 130—202 页,中华书局,1988 年。又参阅王煦华:《顾颉刚关于夏史的论述》,《夏文化研究文集》,第 124—127 页,中华书局,1996 年。

② 同上书,第 88—138、199—201 页。

③ 同上书,第 139—198 页。

南陵,夏侯皋之墓也。’则河、洛之间为夏代政治中心自无疑义。所恨者,夏代史迹无文字可证明耳^①。”1979年顾颉刚、刘起钎合写的《〈尚书·甘誓〉校释译论》(《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1期),明确表示了中国古代不但有夏,而且对夏的地理方位与周围诸小国的关系给予了深入研讨。

实际上,顾先生已接受了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这大概由于学术的发展,时势使然也。

郭沫若先生(1892—1978)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做出的杰出贡献更是有目共睹的。为纪念郭老诞辰百周年,李学勤先生曾撰文《郭沫若同志对夏代的研究》(《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3期)论述到郭沫若的史学研究贡献:“郭沫若在甲骨文和殷商历史文化研究方面的卓越贡献,早已为人所共知。实际上,郭沫若对于夏代历史文化的研究,也起过很重要的先驱作用。”这里主要指的是《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附录:夏禹的问题》^②一文的发表(1930年)。本文为呼应顾颉刚的夏史观所做出的反响,文中对顾说有赞同之处,但也提出不同的见解,他表述如下:“照我的考察是:(一)殷周之前中国当得有先住民族存在,(二)此先住民族当得是夏民族,(三)禹当得是夏民族传说中的神人,(四)此夏民族与古匈奴族有密切的关系。”(《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337页)。显然他肯定夏代的存在,但在研究态度上,他引用胡适的话:“以山西为中心的夏民族,我们此时所有的史料实在不够用,只好置于神话与传说之间,以俟将来史料的发现。”他赞同胡适这种“比较矜慎”的态度。

在研究方法上,郭沫若和王国维一样,用金文资料参证,他列举春秋时期的两篇金文,即齐侯镈、钟及钟铭和秦公簠铭。

齐侯镈、钟金文:“兢兢成唐(汤),有严在帝所,敷受天命,翦伐夏后,则厥灵师,伊小臣惟辅,咸有九州,处禹之堵。”先生的贡献在于从宋以来把“夏”字误释为“履”,

① 李民:《尚书与古史研究》,第99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

②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科学出版社,1960年。

经过先生的解释把“翦伐夏后”与“处禹之堵”连贯起来,“则历来以禹为夏民族祖先之说,于金文上已得一证”。又举秦公簋金文:“秦公曰丕显朕皇祖受天命,鼎宅禹绩,十有二公,在帝之坏,严恭寅天命,保业厥秦,使蛮夏。”据此,郭老认为“上言‘禹绩’,下言‘夏’,则夏与禹确有关系。”郭沫若用金文物证来研究夏史,是对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应用。

另外,郭沫若还提出夏民族向北迁徙和夏与甲骨文土方的关系的看法,推测夏民族“有一部分系逃往南方”。以后,徐中舒、胡厚宣等诸位学者亦赞同此说,发表了相似的看法。

郭文结尾提出:“要之禹与夏就文献中所见者确有关系,此必为夏民族之传说人物,可无疑。又夏民族与匈奴族有近亲之关系,当为中原之先住民族。此事于将来大规模的地下发掘,时可望得到实物上的证据。”后来在他撰写的《奴隶制时代》^①一书中,认为夏代“顶多只能达到奴隶制的初期阶段”。在夏文化探索还没有开展的情况下,他始终认为“关于夏代的情形,我们今天还不能够多说,且等待日后从地底下能有丰富的资料出现”。可见,先生对待夏史始终带着“比较矜慎”的态度。即使到了1979年,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问题已经提出,史学大师徐中舒先生仍然认为这是“夏史初曙”。如今夏文化探索已取得丰硕成果,有些问题逐渐露出水面,前辈们对夏代那种谨慎、科学的实事求是态度仍然是当今学者学习的榜样。

(三) 夏文化的探索推动了夏史研究的蓬勃开展

徐旭生先生(1888—1976)是夏文化探索的开拓者。他的传世之作《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影响深远(1943年初版,1960年增订本,文物出版社),书中第三章“洪水解”,列“大禹的治水”专节,对大禹治水的范围和方法进行了研究,肯定夏王国的存在,并为夏文化的探索指明了方向。先生逝世后,由助手黄石林先生整理其遗著《尧舜禹》发表(刊载于《文史》三十九辑和四十辑),该文对禹其人其事做了进一步论述。

^① 郭沫若:《奴隶制时代》,科学出版社,1956年。

徐旭生先生不仅著书立说,而且在七旬高龄之年亲往洛阳、登封、偃师等豫西和晋南“夏墟”之地进行考古调查。尔后,二里头遗址、登封告成遗址及晋南夏县东下冯遗址就是在徐老踏察的启发下开始发掘的。

1978年以后,随着夏文化探索热潮的兴起,夏史研究持续不断地深入开展。作为夏史研究的主力军,考古学家们探索夏文化、研究夏史的硕果累累,本书将有专章论及,而本节则主要介绍历史学家们参与研究夏史的情况。

徐中舒先生(1898—1991)较早把视线转向夏史研究,发表了《夏史初曙》一文(《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3期),他认为“夏文化的中心地带现已查明,……夏史已见曙光”。为此,他提出应把重点放在夏史研究方面。徐老为拓展夏史研究思路,启发研究者去考虑,“至于夏王朝疆理所及,声教所及,到达些什么地方呢,这在旧文献中还有一些记录可供参考”。他还根据文献线索,认为成汤灭夏,促使夏民族大迁徙。他提出“夏商之际夏民族一部分北迁为匈奴,一部分南迁于江南为越”。“韦顾既伐”后,也都北迁,“韦即豕韦省称”,“豕韦北迁后又称室韦或失韦”。这些看法,在他后来撰著的《先秦史论稿》(巴蜀书社,1992年)中继续得到阐发和丰富。

李学勤先生较早注意到夏文化问题。他在《新建设》1958年第8期上发表了《近年考古发现与中国古代社会》(原题《近年考古发现与中国早期奴隶制》),文中提出:“在郑州商族文化层与龙山文化层重叠时,其间每每夹有无文化遗物的土层,表明两者不相衔接。在洛达庙、南关外、旭咎王等地果然发现了介于两者之间的文化层,我们称之为‘南关外期’或‘洛达庙期’。它们更接近龙山文化,而有其特异点,如南关外期的棕色陶器、洛达庙期无鬲类空足器等。这两期都早于二里岗下期,最可能是夏代的。”这里讲的“洛达庙期”文化,就是后来大家通称的二里头文化。

后来,随着考古和古文字资料的不断发现,针对国内外古史研究的现状,他提出“咱们今天的学术界有些地方还没有从‘疑古’的阶段脱离出来,不能摆脱一些旧的观点的束缚。在现在的条件下,我看走出‘疑古’的时代,不但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